

从“结构性区隔”看中西部农村男性成婚难生成机制

■ 任知言

(武汉大学 社会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摘要】本研究基于对豫中农村的调查,以“结构性区隔”理论解析中西部农村男性成婚难的生成机制。研究发现,婚姻成本的性别化配置催生务工分化:男性通过代际合作进入沿海高收入行业,形成务工空间区隔;女性依托本地婚姻优势选择县域低强度工作,产生职业环境区隔。这种结构性区隔在时空维度呈现双重效应——空间上,男性异地务工脱离本地婚恋圈层;时间上,高强度劳动致使其错过20-25岁婚龄窗口期。当其返乡时,适婚女性已流向经济更优群体,形成“积累—错配”的实践悖论。研究揭示,结构性区隔包含家庭策略共谋、务工分化强化与年龄约束固化三重作用机制,为破解传统性别视角的静态局限提供了动态解释框架。

【关键词】结构性区隔 成婚难 婚姻成本 务工分化 农村婚姻市场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综述

(一)问题提出

近年来,农村男性面临婚配困境的现象引发广泛关注。根据《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2024》的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底,中国单身人口数量已经超过2.4亿人,其中男性占比约60%^①。特别是在中西部农村,男性适婚比例失衡,大量30岁以上男性面临婚配困境。这一问题不仅关涉个体家庭福祉,更对农村社会稳定与治理提出了严峻挑战。

现有研究表明,农村男性面临婚配困境的成因涉及宏观社会结构、中观家庭资源分配以及微观个体特质等多层次因素。然而,如何将这些因素统一纳入理论框架并形成具有解释力的综合视角,尚需进一步探讨。基于河南省中部地区X村的实地调查,本文尝试通过“结构性区隔”这一分析框架,从婚姻市场中的务工分化和性别分化入手,深入揭示中西部农村适婚男性成婚难的生成机制。

收稿日期:2025-01-08

作者简介:任知言,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家庭社会学、社会转型。

① 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https://www.stats.gov.cn/sj/ndsj/2024/indexch.htm>

(二)文献综述

学界对于农村男性婚配困难成因的研究主要有三个层面的视角,其中宏观分析聚焦人口结构失衡,强调出生性别比长期失调引发的婚姻挤压效应。据研究,农村地区传统的重男轻女观念导致出生性别比长期失衡,适婚男性数量显著多于女性,形成婚姻市场的供需矛盾^[1]。此外,全国范围内婚姻市场的形成以及婚姻圈的扩展也显著影响了农村婚姻现状。城市化进程使大量农村女性外嫁至经济条件更好的地区,农村男性的婚姻选择范围却仍受限于本地,这种不对等的空间流动进一步加剧了农村男性的婚姻困境^[2]。与此同时,婚姻市场中女性的择偶要价逐年上升,婚姻成本高企,增加了农村男性家庭的经济负担^[3]。婚姻挤压研究也指出,在男多女少的婚姻结构中,社会地位较低的男性更容易被排斥出婚姻市场,这种婚姻资源的地区流动加剧了农村男性成婚困难的现象^[4-5]。

中观研究揭示了家庭策略的代际博弈,父辈为子代婚配进行的资源积累往往伴随代际剥削,形成“半工半耕”的特殊家计模式。一些学者通过对不同地区村庄的比较研究发现,村庄的社会网络结构、家庭对子代婚姻的支持力度以及村庄对未婚男性的接纳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男性婚配困难问题的严重性。例如,北方分裂型村庄对未婚男性的排斥较强,南方团结型村庄对未婚男性有一定的结构性保护,而中部地区分散型村庄因社会网络松散,未婚男性的比例更高^[6]。同时,家庭内部资源分配的不均衡也加剧了婚姻市场的压力。贫困家庭由于经济能力有限,难以在婚姻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导致其男性子代面临更高的婚配难度^[7]。

微观视角关注个体生命历程,强调个体特质和行为模式在婚配中的作用。一些学者指出,适婚男性的性格特征(如内向、腼腆)和婚恋能力不足可能导致其在婚姻市场中处于弱势地位^[8-10]。此外,个人观念与婚姻时机的错配也是重要因素。例如,有研究发现,未能在适婚年龄段及时结婚的男性更容易被婚姻市场排斥,形成“无缘型”光棍^[11]。与此同时,家庭内部的代际剥削和资源分配不均也会影响男性的婚姻选择与社会适应能力^[12-13]。这些研究揭示了个体行为与结构性条件交互作用对婚姻困境的深刻影响。

总体而言,现有文献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对农村男性成婚困难进行了多维度探讨。宏观视角揭示了性别比例失衡、婚姻市场扩展与婚姻成本攀升对这一现象的影响;中观视角关注家庭和社区的社会性分化及其对婚姻市场的深远作用;微观视角则从个体特质与家庭资源分配入手,剖析了农村男性婚配困境的形成机制。然而,这些研究在解释农村男性成婚困难问题时存在一定局限。宏观层面多注重全国性趋势,缺乏对地方性差异的深入分析,忽视了空间流动的二次筛选效应;中观层面虽然揭示了村庄与家庭的作用,但对适婚男女务工结构的性别差异关注不足,也未能解释家庭策略的主动参与;微观层面则更倾向于描述个体特质,未能有效融入结构性视角,同时也缺乏对务工年龄的特殊性考量。

为弥补上述研究的局限性,本文提出“结构性区隔”框架,整合宏观制度、中观家庭与微观行动者视角,构建“制度性流动排斥—家庭策略共谋—个体时间困境”三个维度的解释模型,重点分析适婚男女务工分化如何通过社会性别与家庭资源积累模式的互动,影响农村男性的婚配。相较于既有研究,本文的创新在于将空间流动纳入分析核心,揭示了务工分化如何通过时空压缩机制加剧婚配困境,尝试为“农村男性成婚为何困难”的理论研究提供新的启示。

(三)田野与方法

本研究的调研地位于河南省中部某县的X村,全村有3个自然村,9个村民组,耕地面积2234亩,地处平原地区。村内有615户、2440人,其中25岁及以上的未婚人数148人,31人为女性;30岁及以上的未婚人数39人,8人为女性。当地男方成婚通常需要支付10-12万元的彩礼,以及县城一套大约50万元的房产,总的婚姻缔结成本大约为80万元。X村村庄内部经济分化并不明显,由于河南农村地区“陪读”现象较少,初中之后多为寄宿制,许多有男孩的家庭在孩子初中后就开始为其结婚进行积累,因而大多数家庭依靠父子两代人“半工半耕”^[14]的家计模式能够负担儿子的婚姻缔结成本,且当地具有强烈的本地婚偏好,绝大多数为本地婚。X村作为平原地区中等规模村庄,既规避了极端贫困或富裕的干扰,又呈现出当前农村未婚男女性别比失衡与婚姻挤压的典型矛盾。村庄经济同质化消解了阶层分化变量,使10-12万彩礼加50万房产的婚姻成本成为普适性压力,凸显了代际合作积累在其中的重要作用。综合来看,X村具有典型性,是本文比较理想的田野点。在本文中,按照大多数农村的地方性知识界定以及既有研究文献的共识,将“面临婚配困境男性”界定为年龄在25岁及以上未能婚配且婚配无望的农村户籍男性人口。

本研究采用实地调查法,通过无结构式访谈和半结构式访谈收集数据。X村在籍25岁以上未婚人数共148人,其中男性117人,女性31人。共对X村63名适婚青年(男性42人,女性21人)及其家庭成员进行深度访谈,从侧面了解全村未婚148人的未婚原因以及家庭情况。访谈对象年龄跨度在25-54岁,其中47人年龄在25-40岁,16人年龄在40-54岁。访谈对象覆盖不同务工类型,主要为制造业与服务业。访谈内容聚焦家庭生活策略的代际协作模式、家庭及个人婚姻观念以及婚姻成本压力对就业选择的影响(见表1、表2、表3),重点关注高婚姻成本背景下代际合作的经济理性与情感诉求张力。通过分析适婚男女在务工距离、职业强度与返乡频次上的分化,揭示家庭资源积累与婚姻市场机会的结构性区隔。

二、结构性区隔：一个解释框架

本文综合价值与资源双重视角,从村庄内部适婚男女务工结构差异切入,尝试构建中观层次的“结构性区隔”分析框架。通过分析适婚男女家庭结构、务工分化以及婚姻成本压力,揭示中西部农村男性单身过多现象的深层机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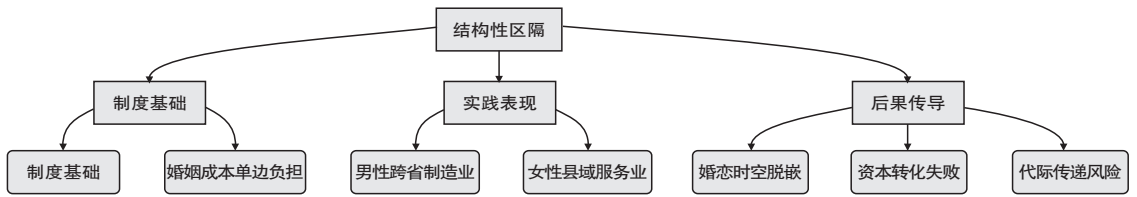


图1 结构性区隔分析框架

“结构性区隔”是指由制度性流动壁垒(户籍制度)、家庭策略共谋(代际积累)与劳动力市场分割(职业性别化)共同塑造的双重排斥系统。其核心特征表现为:一方面是“空间—职业”的复合区隔:男性在高强度跨省务工中形成“经济资本过密化”,女性在县域低强度就业中实现“社会资本再生产”;另一方面是“时间—机会”的结构性错配:务工时长(男性年均9.2个月在外)与婚

龄窗口(20-25岁)的刚性冲突,如图1所示。这一概念不仅关注个体行为选择,还着眼于家庭、婚姻市场和社会结构的多重作用。

基于中西部农村的实际情景,本研究将“结构性区隔”具体化为婚姻市场中的三大核心过程:压力、分化与区隔。

(一)理论基础:结构功能主义与婚姻经济学相结合

一方面,结构功能主义(Structural Functionalism)提供了分析框架。根据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功能理论,家庭在社会系统中承担基本功能,包括人口再生产、经济支持和情感维系。婚姻作为家庭形成的核心机制,其运行受制于社会结构中资源分配和文化规范的影响。在本文案例中,中西部农村的性别分化与劳动分工进一步固化了婚姻资源的不均衡分布,形成了“结构性区隔”。另一方面,婚姻经济学理论揭示了婚配行为中的理性选择。根据贝克尔(Gary Becker)的婚姻市场理论,婚配决策本质上是一个基于成本与收益的优化过程。在中西部农村,由于婚姻缔结成本的单边负担,男性家庭不得不进行高强度的经济资源积累,而女性则因其在婚姻市场中的相对优势拥有更大选择权。婚姻成本的性别差异直接塑造了“务工性别分化”与“务工区域分化”的结构性特征。

此外,布尔迪厄的资本理论可进一步解释“结构性区隔”的深层机制。未婚男性通过外出务工积累经济资本,但由于其与本地婚姻市场的分离,无法同时积累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导致其在婚配竞争中的整体劣势。相反,未婚女性凭借其社会资本的稳定性(如与父母的紧密联系及本地社交圈的优势),在婚姻市场中处于有利地位。

(二)家庭结构中的价值定位与资源配置

一方面,男性家庭具有婚姻成本积累导向。在中西部农村,适婚男性家庭通常以代际传承和婚姻为核心价值目标,父代与子代之间形成“半工半耕”模式。对中西部地区适龄未婚男性父代而言,其人生任务在于帮助子代顺利成婚。子代成婚是其本体性价值的体现^[15]。父代的人生价值高度依附于子代婚姻的成功,并通过自身劳动积累婚姻成本。子代则需前往高收入地区务工,进一步优化家庭资源配置。这种代际协作使得男性家庭在婚姻市场中的能动性表现为资源的高度整合与集中投入^[16]。另一方面,女性家庭存在情感需求与安全考量。女性家庭在婚姻成本压力上明显低于男性家庭,其价值更多体现在对子代的情感关怀与安全保障。父代倾向于让女儿选择本地低强度工作,以便兼顾家庭养老需求,同时减少外出务工可能带来的风险。这种家庭策略进一步强化了女性务工选择的本地化特征。

“结构性区隔”不仅是经济资源的不对称分布,更是文化规范与社会期望的双重产物。男性父代的强责任伦理驱动其家庭资源的集中积累,而女性家庭则出于情感与安全考量,鼓励女性留在本地就业。这种文化模式强化了性别角色分化的社会预期,进一步固化了婚姻市场中的性别资源配置。

(三)务工性别分化的结构性影响

首先,务工地与职业之间存在空间隔离。男性在务工选择上因婚姻成本积累的压力,倾向于前往高收入地区从事高强度劳动,而女性因家庭资源积累压力较低,多选择县城内轻松的第三产业工作。这种选择使得男女双方在地理位置与职业环境上呈现出明显分化,从而削弱了日常交集的可能性。

其次,婚姻市场存在性别比例失衡与区域挤压。中西部农村地区的婚姻市场因女性外嫁倾

向加剧,出现了显著的“区域挤压”效应^[17]。适婚女性流向经济发达地区,而男性则因资源积累需求被困于传统的外出务工与本地相亲婚模式。婚姻资源的非对称流动,使得本地婚姻圈逐步缩小,未婚男性的婚配机会减少。

最后,家庭需要资源整合以及面临婚姻成本的单边承担。在婚姻市场的动态结构中,男性家庭为增强在婚配过程中的竞争力,往往采用资源整合与高度积累的策略。近年来,中西部地区婚姻成本呈逐年递增态势,主要体现在县城房产购置以及高额彩礼支付等方面。这种仅由男方家庭承担成本的单边负担机制,不仅使男性家庭面临更为沉重的经济压力,还在婚姻市场中进一步扩大了适婚男女之间的地位差距,对婚姻市场的均衡发展和社会结构的稳定产生了潜在影响。

(四)“结构性区隔”的动态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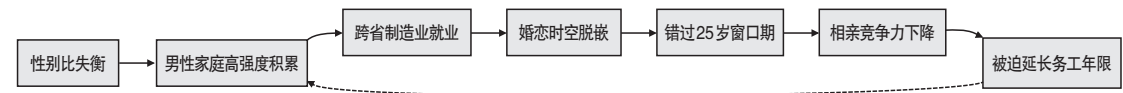


图2 “结构性区隔”三重作用机制

“结构性区隔”作为解释未婚男性婚配困难的重要机制,如图2所示,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关键环节:首先,在压力传导阶段,城镇化进程中的婚姻成本攀升,迫使男性家庭采取“跨代际积累”策略。在传统社会中,农民内部婚配相对容易^[18]。随着婚姻圈的扩大及女性外嫁倾向增强,男性需承担更多经济积累任务以维持婚姻竞争力。在这一过程中,男性家庭逐步优化劳动力配置,将子代推向高强度、高收入的外地务工市场,以此实现婚姻成本支付目标。其次,在空间分化阶段,务工选择的性别差异形成双重隔离。务工地与工作内容的性别分化显著强化了适婚男女的空间隔离。男性的务工选择受制于经济目标,他们常年在外出务工且返乡频率较低;而女性则因情感和安全考虑多留在本地从事轻松工作。这种分化使得适婚男女在日常接触和交往中产生结构性隔绝。最后,在机会闭合阶段,本地婚姻圈的时间刚性显著,适婚男性需在22-25岁间完成婚配。一旦错过婚姻窗口期,年龄增长使其竞争力进一步下降,形成“无缘型”光棍^[19]。错失婚配机会的男性虽通过增加务工积累试图弥补,但因长期离家无法建立有效的本地婚姻资源,最终被固化为“无缘”状态。

通过以上分析,“结构性区隔”机制揭示了农村未婚男性在婚姻市场中婚配困难的深层逻辑。男性家庭的高积累压力与女性家庭的本地化倾向共同塑造了这一机制。研究需进一步探讨婚姻成本压力的跨区域影响及其对性别分化的长期效应。

三、务工分化与婚姻困境:X村未婚青年的结构性区隔表征

本研究以河南中部X村为样本,通过分析适龄未婚青年的务工距离、务工强度和返乡频次,揭示中西部农村男性婚配困难的社会结构与文化逻辑。数据来源于实地调查和访谈,结合村庄内部特征,展示了结构性区隔对未婚男女的具体影响。

(一)务工分化的三维特征:空间、职业与行为

首先,务工距离存在空间分化。从务工地的选择中,能清晰洞察适婚男女截然不同的资源

配置逻辑。调查数据^①(见表1)表明,高达84.6%的男性适婚青年选择去异地务工,相比之下,有61.3%的女性选择在本地或县域范围内就业。“在江苏做水电工的8年里,相亲对象都因异地分手,谁也没办法”(访谈编号:20240708-LX)。务工地在性别上的这种分化,一方面切实反映出劳动力市场对于不同性别在需求层面的差异;另一方面,这种差异进一步加深了适婚男女在地理空间上的隔离状态。

表1 河南中部X村25岁及以上未婚男女务工距离情况

务工距离	总人数(N=148)	男性(N=117)	女性(N=31)
本地(本市及以内)务工	37(25%)	18(15.4%)	19(61.3%)
外地务工	111(75%)	99(84.6%)	12(38.7%)

其次,务工强度也有着职业分化。适龄未婚男女在工作类型方面呈现出的分化态势,实则是社会性别角色固化与再生产的一种直观体现。依据调查结果(见表2)不难发现,高达80.3%的未婚男性投身于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工作领域,诸如工厂生产以及建筑工地等。与之相对,90.4%的未婚女性则主要集中于低强度的服务性工作岗位,如奶茶店、服装店等。这种职业选择并非单纯基于经济收益最大化的考量,在很大程度上,它是社会文化长期以来对性别角色传统定位持续作用的结果。男性从事高强度的务工活动,进一步强化了他们在家庭经济体系中承担财富积累的核心角色;而女性选择低强度的就业岗位,则有助于其更好地发挥家庭情感维系与表达的角色功能。

表2 河南中部X村25岁及以上未婚男女务工强度情况

务工强度	总人数(N=148)	男性(N=117)	女性(N=31)
高强度(体力类)工作	97(65.6%)	94(80.3%)	3(9.6%)
低强度(服务或技术类)工作	51(34.4%)	23(19.7%)	28(90.4%)

最后,返乡频次存在行为分化。根据调查数据显示(见表3),在未婚群体中,男性与女性在返乡频次上呈现出显著差异。未婚男性中有88.9%仅在春节期间返回故乡,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55%的未婚女性每年存在多次返乡行为,甚至常年留驻家中。男性返乡频次较低,根源在于其外出务工时面临高强度的工作任务,同时追求较高的经济收入目标。这种状况使得他们与本地婚姻市场的关联逐步弱化。与之不同,女性由于务工距离家庭相对较近,所以能够维持较高频率的家庭联系。上述行为模式产生了一系列影响。一方面,直接减少了适婚男女在日常生活中的交往契机,限制了婚姻关系建立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这种模式进一步强化了“本地婚姻圈”中性别不平等的结构性特征,对婚姻市场的资源配置与社会关系的平衡造成了一定影响。

表3 河南中部X村25岁及以上未婚男女返乡频次情况

返乡频次	总人数(N=148)	男性(N=117)	女性(N=31)
一年一次	118(79.7%)	104(88.9%)	14(45%)
一年多次或常年在家	30(20.3%)	13(11.1%)	17(55%)

① 数据来源:2024年X村村委会户籍资料及务工登记。

（二）婚姻困境的双重锁定：交际圈萎缩与代际压力固化

首先,适龄未婚男女交际圈具有局限性。调查显示,适龄未婚青年的交际圈以家庭、村庄和务工地为主,空间受限显著。未婚男性在工厂或工地等单性别化场所工作,很少有机会接触到未婚女性;相反,女性则通过县域就业环境构建了相对稳定的社交圈层。这种交际圈的不对称性进一步削弱了男女双方建立婚姻联系的可能性。特别是男性错过最佳婚姻窗口期后(通常为25岁前),婚配机会显著降低,形成了“年龄门槛效应”。其次,婚配成本面临单边负担。X村的婚姻成本结构呈现单边性,即主要由男性及其家庭承担^[20]。当地婚配成本包括10—15万元的彩礼及50万元左右的县城房产支出,这种高额成本使得未婚男性家庭在劳动力分配和资源整合上表现出高度的工具性和功能性。在这种背景下,女性家庭的经济压力较小,生活质量相对较高,从而进一步放大了婚姻市场中的性别不平等。最后,男性家庭的代际支持需要不断强化。随着婚姻成本的上升,代际支持成为未婚青年婚配的重要保障。男性家庭需要父代和子代共同分担积累任务,以应对逐年增加的婚姻成本。相比之下,女性家庭的支持需求主要体现在情感维系和养老需求上,经济压力较小。代际支持的差异性进一步加剧了男性家庭的积累负担,形成代际剥削现象。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X村适龄未婚男女青年在务工距离、职业选择和返乡频次上的分化,深刻体现了中西部农村社会性别角色的固化以及婚姻市场的结构性不平等。这种分化不仅导致了未婚男性被逐步隔离在本地婚姻圈之外,也强化了代际支持的不对等性,最终形成“结构性区隔”的婚配困境。

四、未婚男性结构性成婚难的生成机制

在中西部农村地区,婚姻市场受到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性别比例失衡和家庭资源配置的多重影响。男性家庭因婚姻成本上升被迫优化劳动力配置,而未婚女性则因婚姻地位优势选择低成本的本地婚。这种分化造成了适婚男女在婚姻市场中的地位不平等。

在婚姻市场逐步城市化、区域挤压效应显著的背景下,婚姻成本的单边负担机制强化了男性的积累任务,同时削弱了男性与本地婚姻圈的联系。本部分从资源整合的外驱动力、女性婚配考量以及结构性区隔的现实基础三个层面,分析未婚男性结构性成婚难的生成机制。

（一）未婚男性家庭资源整合的外驱动力

为实现子代婚配,农民家庭需要进行劳动力的优化配置以及家庭资源的再分配。当前适龄未婚男性农民家庭面临双重压力,一是婚姻成本的逐年升高带来的经济压力;二是适龄男女性别比例的失衡以及女性外流造成的男女的非对称性流动压力。

一方面,婚姻成本是中西部农村适婚男性家庭资源整合的首要驱动力。婚房购置与高额彩礼成为父代与子代资源整合的关键环节。调研数据显示,X村近年来的彩礼从2010年的约3万元增长至2024年的12—15万元,婚房购置从约20万元攀升至50万元。这种经济压力迫使适婚男性家庭采取“全家参与、深度积累”的策略,通过父子两代人的资源整合来应对高昂的婚姻成本。

另一方面,婚姻挤压存在区域性效应。性别比例失衡与女性外流造成了中西部农村男性的

婚姻竞争进一步加剧。调研发现,X村未婚女性中,受教育水平较高者倾向于外流发展,而本地男性因地理限制和经济条件缺乏吸引力,很难引入外地女性。婚姻挤压的区域性效应强化了本地婚姻市场的资源不对称,使男性家庭被迫增加资源积累,以应对这一结构性危机。

父代与子代在婚姻成本压力下形成的“代际合作契约”,实质上是家庭在面临“结构性区隔”时的主动适应,呈现出“家庭策略的共谋”特征。具体表现为:首先是工具理性主导,通过父子两代人的跨代分工,实现家庭资源的快速积累;其次是“时间变现策略”,通过牺牲子代婚恋机会时间(在外务工年限)换取家庭收入的短期快速增长,以获得在本地婚姻市场的优势地位;最后,若子代未能因此实现婚配,则会归咎于个体的努力不足或家庭经济实力不济,而非结构性排斥。这一行为修正了贝克尔婚姻经济学中的假设,即农村家庭的婚配决策并非单纯的成本收益计算,而是其本体性价值以及社会性价值之间的张力。

(二)未婚女性及其家庭的婚配考量

首先,女性自身会出于对情感与安全的优先性考量。从调查来看,中西部尤其是河南农村,由于教育竞争激烈以及教育资源的城乡差异,很多适龄未婚女性学历水平为高中或中专,其父母一般会让女儿留在身边就近务工。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为了女儿的安全考虑,由于年纪较小,外出太远会让父母担心。二是就近务工方便照顾女儿的日常生活,也希望女儿可以经常陪伴在身边。

其次,家庭对女儿养老有着现实需求。当前,很多农村地区家庭都有本地婚倾向,除了知根知底以及文化认同外,更主要的是女儿已经被纳入家庭养老的范围内。随着农民家庭发展压力的增大以及抚育责任链条的延长,每个家庭都面临着城镇化压力,很难依靠单一家庭实现对老人的照料,需要多个家庭的参与。对于多子女家庭而言,儿子儿媳为提高家庭积累能力很难兼顾到老人的养老,这个时候如果女儿嫁在本地,可以分担家庭的养老压力。因此,多数家庭希望女儿可以在当地实现婚配。

最后,未婚女性的个体追求。如果说前两种考量体现家庭策略的延续性,那么新生代女性的个体化追求则折射出城市化进程带来的价值嬗变。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动,新生代农民工都有了城市生活体验,对生活质量有更高的要求,绝大多数都有明确的城市化取向。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农民工倾向于进入城市从事第三产业等相对轻松的工作^[21]。对于没有结婚负担的年轻女性来说,她们更看重工作环境以及工作强度,县城的服装店、奶茶店等是她们的主要选择,工资只要能够维持本人的日常开销即可。县城的距离也适中,她们可以每天回家,日常吃住也没有额外的开支,可以过上一种相对轻松且有个人体验的生活。

(三)未婚男性结构性区隔的现实基础

农村地区未婚男性家庭在日益上涨的婚姻成本以及未婚女性向外流动日渐增多的情况下,只能以增加家庭积累并深度整合家庭内部资源的方式提高子代在婚姻竞争中的优势。为此,他们不得不举家长时间外出务工。这是未婚男性在本地婚姻圈被“区隔”的首要原因。适龄未婚女性出于对家庭情感和个体生活体验的追求往往与未婚男性从事不同类型的工作,未婚男女很难在生活中出现交集,这是未婚男性“无缘”成婚的另一原因。不容忽视的是,常年在外务工的未婚男性由于在村时间短暂,很难在年轻时期迅速实现婚配,一旦错过了婚姻时间节点,也就很难成婚了。

“案例 20240709—CLJ 婚恋时间轨迹”：

2018 年(22 岁):深圳电子厂,月薪 4500 元,相亲 2 次失败

2020 年(24 岁):转苏州工地,月薪 8000 元,春节相亲 5 人无果

2023 年(27 岁):存款 30 万元,仅获二婚女性相亲机会

2024 年(28 岁):“已经习惯光棍生活”(自我认同转变)

一是务工地选择的分化。男性因家庭资源整合的需求,倾向于选择到高收入的经济发达地区务工,而女性因情感与安全考量,则多选择本地第三产业就业。调研数据显示,X 村 84.6% 的未婚男性选择外地高强度工作,而 61.3% 的未婚女性选择在本地或县城就业。“在外务工几乎看不到没结婚的女孩,就算有,也一般都嫁到南方那些好地方去了,谁也不会来咱们河南农村”(访谈编号:20240709-CLJ)。中西部农村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很难吸引外地未婚女性嫁入,这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婚姻的“区域挤压”。

基于此,常年在外务工的未婚男性几乎只能依靠本地的相亲介绍实现婚配。据了解,近几年结婚的年轻人几乎没有自由恋爱的,极个别是从高中开始谈朋友一直到结婚,“脱离了学校之后,男孩就没有什么和女孩认识的机会,只能靠人介绍”(访谈编号:20240711-WJC)。未婚男性由于常年在外务工与本地人的接触较少,一般来说,本地婚讲求知根知底,但目前多数的相亲都只是粗略的情况介绍,这就使得缺乏长期相处机会的未婚男女很难在短时间内达成婚约。对未婚男性来说,与未婚女性相处时间的短暂以及结识途径的匮乏,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成婚的难度。因此,务工地的显著分化,直接削弱了未婚男女的互动机会。

二是职业分化与空间隔离。调查发现,当前农村婚姻成本的主要承担者是未婚男性及其所在家庭,女性在婚前几乎没有压力。在未婚男性及其家庭为提高家庭积累而外出务工,且多从事高强度长时间工种的情况下,没有沉重发展压力的未婚女性几乎不会从事同样辛苦的职业。“男性一般外出务工都是在工厂和工地,这两个地方很少有女性,就算有也是结了婚和丈夫去的”(访谈编号:20240712-WX)。工厂和工地艰苦的工作环境以及距离城市相对偏远的位置很难吸引到年轻女性,未婚的她们更看重工作的环境以及工作强度,收入只要能够维持其日常开销即可。“在结婚前先享享福过自己喜欢的生活,等结了婚就会辛苦很多”(访谈编号:20240707-XLL)。但中西部县域的发展水平决定了未婚男性并不能在此务工,否则很有可能因实现不了家庭积累目标而无法成婚。

距离村庄较近的县城是农村未婚女性就业的优先选择。据了解,学历较低年轻女性多数不愿外出离家太远,她们对父母有着较强的依赖心,希望能够留在父母身边。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县城有着不输于地级市的消费以及生活配套,加之相对低的生活成本,成为未婚女性的舒适区。县城的奶茶店、服装店等就业门槛相对较低的店铺也给她们提供了不少的就业机会。从根源上来说,未婚女性能在县城接受较低工资的底气在于当地女性在婚姻圈的绝对优势地位,即女性不愁嫁且没有婚姻成本压力。

高强度劳动与低强度就业的职业分化进一步固化了未婚男女的空间隔离。未婚男性的工作场所以工厂和工地为主,未婚女性则集中于服务业,这使得两者在日常生活中缺乏交集。这种分化不仅限制了男性的婚配机会,也使其在婚姻市场中处于更加弱势的地位。

三是关于婚姻的时间节点以及窗口期。从调查来看,农村适婚男性未能婚配而单身的原因

并非不想成婚,而是无法成婚。个体在不同年龄阶段所拥有的婚姻选择权是不同的。在X村,一般男孩高中毕业后外出务工,大概20岁家里就开始张罗相亲,“每年过年是村里最热闹的时候,最多的时候一个女孩一天要见8个男孩,但男孩能见的女孩比较有限”(访谈编号:20240721-XYK)。与此同时,“一般来说男孩在25岁之后想要结婚的难度就会增加,也很少有年轻女孩愿意和他相亲,只能找年纪稍大的或二婚的”(访谈编号:20240720-LJT)。

与此同时,农村未婚男女性别比例失衡是一个持续恶化的过程。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以及教育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年轻女性向外流出,错过最佳婚配年龄的男性会面临更大的竞争。在当地村庄,没有年龄优势的男性只能更加努力务工来提升个人条件,但矛盾的是,高强度长时间的外地务工会让他们错失与本地未婚女性的结识机会,逐渐被区隔在本地婚姻圈之外。从调查情况来看,常年在外出务工的男性大龄未婚的比例较高。

五、理论整合:结构性区隔的生成逻辑与理论启示

本研究以中西部农村地区的婚姻困境为切入点,提出了“结构性区隔”理论框架,阐释了适婚男性在婚姻市场中的被动处境及其成婚难的生成机制。基于豫中X村的田野调查,本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与启示。

(一)结构性排斥的三重机制

首先,结构性排斥存在着资本转化悖论。适龄未婚男性家庭通过代际协作实现经济资本的高度积累(如案例CLJ存款30万元),但其本人却在务工流动中脱离了本地社会关系网络。女性依托县域就业维系的生活状态(如奶茶店店员XLL构建的社交圈层),虽然收入较低,却能够通过日常交往积累婚姻资本,从而形成对部分男性“经济资本单极化”的隐性排斥,出现“赚钱越多一择偶越难”的悖论。

其次,结构性排斥体现的是家庭与制度的共谋逻辑。家庭策略并非被动适应,而是主动参与排斥系统的再生产。父代将“帮儿子成家”视为人生终极目标(即本体性价值),通过“半工半耕”模式将子代推向高收入但高流动的务工市场。这种代际契约实质上是户籍制度与婚姻市场共谋的产物,大批家庭重复着“外出挣钱—错过相亲—更难结婚”的循环。

最后,婚姻市场的时间节点效应。农村婚姻市场的时间节点效应显著。适婚男性若在22-25岁之间未能婚配,随着年龄增长及婚姻资源流失,其婚配难度将急剧增加。一旦错过婚姻窗口期,未婚男性将面临更大的婚配压力,甚至完全丧失婚姻机会。婚姻窗口期(20-25岁)的刚性约束,使男性的经济积累阶段与婚恋黄金期高度重叠,形成了时间的挤压效应。

(二)理论启示

本研究通过中西部农村特定案例,揭示了适婚男女在务工地选择与家庭资源整合中的结构性分化,深化了对“婚姻挤压理论”“社会排斥理论”以及“生命历程理论”的理解,为分析农村男性婚姻困境提供了新的学理视角。

首先,突破了婚姻挤压的静态叙事。传统性别比解释难以阐明“有车房却单身”的悖论。本研究通过务工流动的“二次筛选”机制,揭示了空间隔离(男性跨省务工率84.6%)如何加剧性别比例失衡,这为婚姻挤压理论注入动态分析维度。

其次,修正了未婚男性及其家庭在社会排斥中完全被动的叙事方式。与通常认为的“被动受害”不同,大多数农村男性及其家庭在“娶妻光宗”的价值驱动下,主动选择外出务工。这种“发展主义式自我排斥”,突破了社会排斥理论对被动受害者的预设,彰显出农民家庭在现代性冲击下的策略困境,但也形成了一种“为了结婚而远离婚姻”的逻辑悖论。

最后,重构了年龄在农村婚姻中的社会意义。在X村,25岁像道无形的分水岭,25岁前的小伙子相对易成婚,过了这个年纪就被贴上“大龄”标签。这种社会性年龄歧视比生理衰老更残酷——当案例中的CLJ28岁时,媒人只愿给他介绍离异女性。年龄在这里不再是自然刻度,而是衡量婚姻价值的标尺,这一变化折射出乡村社会对“成家立业”的严苛时间表,其本质是一种结构性年龄歧视。

[参 考 文 献]

- [1] 岳 岭:《姻缘难觅——中国农村人口性别比例失调与“光棍”大军的形成》,载《青年研究》,1995年第1期。
- [2] 王玉蓉:《农村女性跨区外嫁结构性动因与男性婚姻危机——基于青海土族X县C村的个案研究》,载《青海社会科学》,2020年第4期。
- [3] 桂 华 余 练:《婚姻市场要价:理解农村婚姻交换现象的一个框架》,载《青年研究》,2010年第3期。
- [4] 孙新华:《婚姻挤压与农村代际关系变动》,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2期。
- [5] 杨 华:《农村婚姻挤压的类型及其生成机制》,载《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
- [6] 李永萍:《我国农村“光棍”的区域分布及其形成机制——基于村庄社会结构的分析》,载《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6期。
- [7] 王晓慧 刘燕舞:《农村大龄青年婚配困难问题研究——社会剥夺的视角》,载《中国农村观察》,2017年第2期。
- [8] 何绍辉:《社会排斥视野下的农村青年婚配难解读——来自辽东南东村光棍现象的调查与思考》,载《南方人口》,2010年第4期。
- [9] 韩庆龄:《结构边缘与文化排斥:农村“老实人”光棍的社会形成机制》,载《青年研究》,2018年第3期。
- [10] 宋丽娜:《婚恋技术主义:农村90后青年的婚恋实践》,载《中国青年研究》,2016年第9期。
- [11][19] 张富富:《观念与时机的错配:农村“无缘型”光棍的生成机制——基于黔中L村的实地调查》,载《当代青年研究》,2024年第2期。
- [12] 陶自祥:《代内剥削:农村光棍现象的一个分析框架——基于渝北S村长子打光棍的调查》,载《青年研究》,2011年第5期。
- [13] 余 练:《婚姻连带:理解农村光棍现象的一个新视角——对鄂中和鄂东三村光棍成窝现象的解释》,载《人口与经济》,2017年第1期。
- [14] 夏柱智 贺雪峰:《半工半耕与中国渐进城镇化模式》,载《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12期。
- [15] 贺雪峰:《农民价值观的类型及相互关系——对当前中国农村严重伦理危机的讨论》,载《开放时代》,2008年第3期。
- [16] 李永萍:《功能性家庭:农民家庭现代性适应的实践形态》,载《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 [17] 刘燕舞:《区域挤压:理解中国男性婚配困难的一个分析框架》,载《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
- [18] 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与社会结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5页。
- [20] 刘成良:《因婚致贫:理解农村贫困的一个视角》,载《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 [21] 任知言:《找回家庭——农民工家庭生活的实体化模式探究》,载《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2期。

(责任编辑:崔 伟)